

新編諸子集成

中華書局

抱朴子外篇校箋

上

新編諸子集成

抱朴子外篇校箋

上 楊明照撰

中華書局

## 前 言

子論從漢到晉特別興盛，這一方面是子部演爲集部過程中的必然現象，同時也是子書逐漸式微文集日益發達的顯著標誌。葛洪的抱朴子外篇，就是東晉初年寫定的一部傑出子論〔一〕。全書內容豐富，「詞旨辨博」，尤其是對社會和文學，頗能「越世高談，自開戶牖」，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，是我國文化寶庫中的一分珍貴遺產。

晉書葛洪傳說：「洪博聞深洽，江左絕倫，著述篇章，富於班、馬。又精辯玄蹟，析理入微。」據有關文獻的記載，葛洪撰述之多，方面之廣，記誦之淵博，文筆之茂密，在兩晉士林中是寡二少雙的。雖然絕大部分作品已經佚亡，但幸而流傳下來的如抱朴子內外篇、肘後備急方和神仙傳，就更加重要，成爲研究葛洪僅有的第一手資料了。

抱朴子外篇寫作的時間比內篇早些（見內篇黃白），原「各起次第」（內篇序），分別單行，內容亦迥不相同。外篇自敘說：「其內篇言神仙方藥、鬼怪變化、養生延年、禳邪却禍之事，屬道家；其外篇言人間得失，世事臧否，屬儒家。」由於兩書的性質各異，隋書經籍志以下的目錄書，幾乎都是分別著錄的。宋尤袤遂初堂書目始將內外篇合二而一，歸入道家

類。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道家類尤而效之，據明盧舜治本著錄，題曰抱朴子內外篇八卷。並謂外篇大旨「亦以黃、老爲宗」。歸類和論斷，都值得商榷。

「言人間得失，世事臧否」，是葛洪撰述抱朴子外篇的主要目的，針對性非常鮮明，哪裏是「以黃、老爲宗」？我們知道，西晉王朝統一全國後，經濟逐漸恢復，社會比較安定，曾呈現過短暫的表面繁榮局面。但隨之而來的是統治集團的爭權奪利和腐化墮落，號稱的「太康盛世」剛一過去，就爆發了「八王之亂」；接着又是西北少數民族貴族的入侵。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交相發展，給廣大人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，也顛覆了西晉王朝的統治政權。可是，那些享有各種特權的士族，面對日益尖銳複雜的社會矛盾，却熟視無睹，充耳弗聞。貪婪，險毒，荒淫，奢侈，虛偽，放蕩，便是他們的所行所爲。何曾料到後來「飛鋒薦於琅闔，左衽掠於禁省，禾黍生於廟堂，榛莠秀乎玉階，雲觀變爲狐兔之藪，象魏化爲虎豹之蹊，東序烟燼於委灰，生民焦淪於淵火」（漢過〔三〕）一系列不可饒恕的深重罪孽呢！

在萬方多難，八表同昏的年歲裏，葛洪並未萎靡不振，得過且過，而是自覺地想方設法刻苦學習：

年十有三，而慈父見背，夙失庭訓。飢寒困瘁，躬執耕穡。……又累遭兵火，先人典籍蕩盡。農隙之暇無所讀，乃負笈徒步行借。又卒於一家，少得全部之書。益破功日

伐薪賣之，以給紙筆。「晝」就營田園，處「夜」以柴火寫書。……常乏紙，每所寫「皆」反覆有字，人尠能讀也。年十六，始讀孝經、論語、詩、易。貧乏無以遠尋師友，孤陋寡聞，明淺思短，大義多所不通。但貪廣覽，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。曾所披涉，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，下至短雜文章，近「將」萬卷。（自敘）

這段文字告訴我們：一個人的境遇，不管生活有多麼苦，學習條件是多麼差，祇要肯想辦法，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，也沒有不能自學成材的。

葛洪不僅閱讀了很多的書，而且還寫了不少「彈斷風俗，言苦辭直」的文章。儘管有人擔心將會「取憎在位，招擯於時」，但他却以「不忍違情曲筆，錯濫真偽」作答。這在「虛美隱惡」、「屬華豔以取悅」（並見應嘲）的當時，是多麼不畏強禦！跟那些粉飾現實，「辭意夷泰」的作品相比，簡直是判若天淵。外篇中如酒誡、疾謬、譏惑、刺驕等篇，對社會現實的揭露和抨擊，直言不諱，毫不含糊；就是漢過、吳失兩篇，用意還是在託古刺今，借題發揮（三）。

魯迅先生所說的「論及晉末社會狀態」（四），大概就包有這些篇在內的吧。

空談非徵，下面無妨選錄幾段來印證：

若夫王孫公子，優游貴樂，婆娑綺紈之間，不知稼穡之艱難，目倦於玄黃，耳疲乎鄭、衛，鼻饜乎蘭麝，口爽於膏粱，冬沓貂狐之溫（溫）麗，夏縝紗縠之翩飄，出驅慶

封之輕軒，入宴華房之粲蔚，飾朱翠於楹棧，積無已於篋匱，陳妖冶以娛心，酒醺醑以沈醉，行爲會飲之魁，坐爲博奕〔弈〕之帥，省文章既不曉，覩學士如草芥，口筆乏乎典據，牽引錯於事類，劇談則方戰而已屈，臨疑則未老而憔悴。雖叔〔菽〕麥之能辯（辨），亦奚別乎瞽瞍哉！（崇教）

「世胄躡高位」的晉代，公子哥兒們不學無術，倚仗父兄的特殊權勢，講闊綽，圖享受，荒淫腐化，無所不用其極。吃喝玩樂之外雖一無所知，而他們的特殊地位，却依然如故。

愚夫行之，自矜爲豪，小人徵之，以爲橫階。亂靡有定，寔此之由也。然敢爲此者，非必篤頑也，率多冠蓋之後，勢援之門，素頗力行善事，以竊虛名。名既粗立，本情便放：或假財色以交權豪，或因時運以佻榮位，或以婚姻而連貴戚，或弄毀譽以合威柄。器盈志溢，態發病出，黨成交廣，道通步高。清論所不能復制，繩墨所不能復彈。遂成鷹頭之蠅，廟垣之鼠。……有斧無柯，其如之何哉！（疾謬）

「投鼠忌器」，自古而然。「冠蓋之後，勢援之門」，既有靠山，又騙得信任，拉關係，樹黨羽，其胡作非爲，誰又敢過問呢！

秉維之佐，牧民之吏，非母后之親，則阿諂之人也。……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，而竊大理之位，不識几案之所置，而處機要之職，不知五經之名目，而饗儒官之祿，不

閑尺紙之寒暑，而坐著作之地；筆不狂簡，而受駁議之榮；低眉垂翼，而充奏劾之選；不辨人物之精粗，而委以品藻之政；不知三才之軍勢，而軒昂節蓋之下；屢爲奔北之辱將，而不失前鋒之顯號；不別菽麥之同異，而忝叨顧問之近任。……繼芻狗而責盧、鵠之效，繡鷄、鷲而崇鷹揚之功，其不可用，亦較然矣。（吳失）

「母后之親」和「阿諂之人」，是統治者認爲最可信賴和依靠的力量，必然要分別安插在各個重要部門，哪裏會攷慮他們的勝任不勝任！

世道多難，儒教淪喪，文、武之軌，將遂凋墜。孤貧而精六藝者，以游、夏之資，而抑頓乎九泉〔淵〕之下；因風而附鳳翼者，以駑庸之質，猶迴遑乎霞〔雲〕霄之表。舍本逐末者，謂之勤修庶幾；擁經求己者，謂之陸沈迂闊。於是莫不蒙塵觸雨，戴霜履冰，懷黃握白，提清挈肥，以赴邪徑之近易，規朝種而暮穫矣。……汲汲於進趨，悒悒於否滯者，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，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？此川上所以無人，子衿之所爲作。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，憂道者所以含悲而頹思也。（勗學）

「世道多難，儒教淪喪」，勢必導致社會輕視讀書的不良傾向。這在西晉後期最爲突出。一貫重視「儒學」、「儒教」和強調「勗學」、「崇教」的葛洪，難怪要慨乎言之了。

或有德薄位高，器盈志溢，聞財利則驚掉，見奇士則坐睡。繼縷杖策，被褐負笈

者，雖文豔相、雄，學優融、玄，同之埃芥，不加接引。若夫程鄭、王孫、羅哀之徒，乘肥衣輕，懷金挾玉者，雖筆不集札，菽麥不辨，爲之倒屣，吐食握髮。余徒恨不在其位，有斧無柯，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裔，投畀於有北。彼雖赫奕，刀尺決乎（孫星衍謂有脫文）勢力足以移山拔海，吹呼能令泥象登雲，造其門庭，我則未暇也。而多有下意怡顏，匍匐膝進，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。（交際）

「文籍雖滿腹，不如一囊錢。」漢代如此，晉代亦復如此。其實，別的朝代又何嘗不如此呢！「德薄位高」者的唯財利是視，的確可鄙，而那些「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」者的搖尾乞憐，也同樣可鄙。

亦有出自卑碎，由微而著，徒以翕肩斂迹，偃伊側立，低眉屈膝，奉附權豪，因緣運會，超越不次。毛成翼長，蟬蛻泉壤，便自軒昂，目不步足，器滿意得，視人猶芥。或曲晏〔宴〕密集，管絃嘈雜〔嘯〕，後賓填門，不復接引；或於同造之中，偏有所見，復未必全得也。直以求之差勤，以數接其情，苞苴繼到，壺榼不曠者耳。……乃衰薄之弊俗，膏肓之廢疾，安共爲之，可悲者也。（刺驕）

卑躬屈己，鑽營捧拍，以圖升遷。目的達到，便得意忘形，自以爲了不起，於是利用職權，既要享受，又要發財了。官場中這樣的事哪個朝代都有，豈止西晉爲然！



小大喪亂，亦罔非酒。然而俗人是酣是酒：其初筵也，抑抑濟濟，言希容整，詠湛露之「厭厭」，歌「在鎬」之「愷樂」，舉「萬壽」之觴，誦「溫克」之義。日未移晷，體輕耳熱。夫琉璃海螺之器並用，滿酌罰餘之令遂急。醉而不止〔出〕，拔轄投井。於是口涌鼻溢，濡首及亂。屢舞蹀躞，舍其坐遷；載號載呶，如沸如羹。或爭辭尚勝，或啞啞獨笑，或無對而談，或嘔吐几筵，或眞蹶良倡，或冠脫帶解。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盼，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，遲重者蓬轉而波擾，整肅者鹿踊而魚躍。口訥於寒暑者，皆搖掌而諧聲；謙卑而不競者，悉裨瞻〔膽〕以高交。廉恥之儀毀，而荒錯之疾發；闔茸之性露，而傲佞〔很〕之態出。精濁神亂，臧否顛倒。（酒誡）

這活像一幅酗酒圖。酒鬼們的各種醜態，描繪得維妙維肖，淋漓盡致。

喪亂以來，事物屢變：冠履衣服，袖袂財〔裁〕制，日月改易，無復一定。乍長乍短，一廣一狹，忽高忽卑，或粗或細。所飾無常，以同爲快。其好事者，朝夕放效。所謂「京輦貴大眉，遠方皆半額」也。（譏惑）

俗之服用，俄而屢改：或忽廣領而大帶，或〔此下似脫一字〕促身而修袖，或長裾曳地，或短不蔽脚。（自敘）

操時髦，順潮流，奇裝怪服，日新月異，你追我趕，唯恐落後，遠在西晉已然。如果葛洪

生乎今之世，也許還會多寫幾筆。

葛洪論述的八個方面，既深刻，又生動，西晉的政治概況和社會風貌，皆歷歷在目。其觀察之銳敏，筆鋒之犀利，較諸干寶晉紀總論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我們今天要研究晉代歷史，抱朴子外篇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晉人著作，有時它比唐修晉書還重要。

漢、魏子論中，如揚雄法言、桓譚新論（五）、王充論衡、曹丕典論和桓範政要論（六），都有這樣那樣、或多或少的文論。以「文儒」（自敘）自任，而又強調「聖人實之於文，鑄之於學；夫文、學也者，人倫之首，大教之本」（七）的葛洪，抱朴子外篇裏有大量文論，是很自然的。

今勝於古的文學觀，是葛洪的創見，也是他對文學最基本的論點。他是用時代的演變和事物的改進的實例來論證這個道理的：

且夫古者事事醇素，今則莫不彫飾。時移世改，理自然也。至於罽錦麗而且堅，未可謂之減於蓑衣；輜駟妍而又牢，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。……若舟車之代步涉，文墨之改結繩，諸後作而善於前事，其功業相次千萬者，不可復縷舉也。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，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！（鈞世）

社會是不斷向前發展的，作為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，無論內容和形式都必然要隨着起變化，纔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，也必然是後來居上，今勝於古。葛洪在這裏不僅提出了「時

移世改，理自然也」的論點，而且還通過「諸後作而善於前事」的實例來印證。像他這種極其進步的論斷，可以說是發前人所未發。爲什麼葛洪有這樣卓越的識見呢？由於他對事物的看法，具有樸素唯物論的觀點的緣故。他在省煩篇裏也說：「若謂古事終不可變，則棺槨不當代薪埋，衣裳不宜改裸袒矣。」這種論斷，還是從事物的發展出發，與他主張文學的今勝於古是一致的。

葛洪今勝於古的文學主張，不止是用事物的演進作依據，而且還舉出具體的作品來對比：

且夫尚書者，政事之集也，然未若近代之優文、詔策、軍書、奏議之清富瞻麗也；毛詩者，華彩之辭也，然不及上林、羽獵、二京、三都之汪濊博富也。……若夫俱論宮室，而奚斯「路寢」之頌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？同說遊獵，而叔畋、盧鈺之詩，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？竝美祭祀，而清廟、雲漢之辭，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？等稱征伐，而出軍（車）、六月之作，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？（鈞世）

這些例證，祇從篇章的繁簡和辭句的「瞻麗」、「博富」與否來評定其高下，而沒有攷慮到它們的思想內容，誠然還不免囿於形式，但對於文學的由簡而繁，由質樸而華麗的發展趨勢有所認識，已屬難能可貴；至於把儒家奉爲經典的書、詩認爲不如漢、晉人的作品，更是別

具慧眼，不同凡響。遠在一千六百餘年前，葛洪就有這類不尋常的識見，的確值得珍視。不僅他以前和同時代的人未曾有過，就是後來的文學理論批評專家如劉勰、鍾嶸等，也還沒有這樣的論述哩！

積習已久的貴遠賤近文壇風尚，是與葛洪今勝於古的主張不相容的，自然要極力加以抨擊：

然守株之徒，嘍嘍所翫，有耳無目，何肯謂爾。其於古人所作爲神，今世所著爲淺，貴遠賤近，有自來矣。……是以古書雖質樸，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；今文雖金玉，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。（鈞世）

又世俗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時，雖有追風之駿，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；……雖有益世之書，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。……俗士多云：「今山不及古山之高，今海不及古海之廣，今日不及古日之熱，今月不及古月之朗。」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？重所聞，輕所見，非一世之所患矣。（尚博）

文學本是時代的產物，是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。貴遠賤近的不良風尚，是文學發展進程中的一大障礙。葛洪既有今勝於古的主張，其加以抨擊，是很自然的，也是非常正確的。可是，葛洪並不因爲主張今勝於古和反對貴遠賤近的關係，就全盤否定了古人的著

作。鈞世篇說：

然古書雖多，未必盡美；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，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。然而譬如東甌之木，長洲之林，梓豫雖多，而未可謂之爲大厦之壯觀，華屋之弘麗也；雲夢之澤，孟諸之藪，魚肉〔之〕雖饒，而未可謂之爲煎熬之盛膳，渝、狄之嘉味也。前人的創作成果本是精華與糟粕夾雜着的，簡單地肯定或否定都不妥當。葛洪認爲「古書雖多，未必盡美」這一總的評價是正確的。同時他又指出，多而「未必盡美」的古書，像「山淵」一樣，「屬筆者」可以從中「采伐漁獵」，汲取精華，化爲己有，從而寫出更好的作品來。這種看法，還是較全面的。

文、德並重，跟今勝於古一樣，都是葛洪不同舊談的論點。衆所周知，重德輕文是儒家的正統觀念，歷代相承無異議。循本篇却說：「德行、文章者，君子之本也。」把德行、文章二者都視爲「君子之本」，並未有所軒輊。前尚博篇曾設爲問答，闡發得更充分：

或曰：「德行者，本也；文章者，末也。故四科之序，文不居上。然則著紙者，糟粕之餘事；可傳者，祭畢之芻狗。卑高之格，是可識矣。文之體略，可得聞乎？」抱朴子答曰：「荃可以棄，而魚未獲，則不得無荃；文可以廢，而道未行，則不得無文。且文章之與德行，猶十尺之與一丈，謂之餘事，未之前聞。……且夫本不必皆珍，末

不必悉薄。譬若錦繡之因素地，珠玉之居蚌石，雲雨生於膚寸，江河始於咫尺，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，未可呼爲餘事也。」

簡要的答語，概述了他強調文章與德行同等重要的旨意。上文還有這樣的話句：「德行〔爲〕有事，優劣易見；文章微妙，其體難識。夫易見者，粗也；難識者，精也。夫唯粗也，故銓衡有定焉；夫唯精也，故品藻難一焉。吾故捨易見之粗，而論難識之精，不亦可乎？」認爲文章比德行更勝一籌。像他這種突破前人窠臼，極其大膽的文學觀，在我國古代文論中，是不曾有過的。

與力倡今勝於古、強調文德並重極有關連的，是對文學的社會作用的推崇。葛洪認爲「魯連射書以下聊城」，其力量是「過於百萬之衆」〔八〕的，「韓信傳檄而定千里」，其功效是「勝於雲梯之械」〔九〕的。把文章的功能說得那麼巨大，目的就是要突出文學的社會作用。因此，他強調「立言者貴於助教」，「君子之開口動筆，必戒悟蔽，式整雷同之傾邪，磋礪流通之闇穢」（並見應嘲）。所以他衡量作品，首先注意其實用價值。應嘲篇說：

而著書者，徒飾弄華藻，張磔迂闊，屬難驗無益之辭，治靡麗虛言之美，……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。何異畫敖倉以救飢，仰天漢以解渴？……管青鑄騏驎於金象，不如駑馬之周用。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，丘不與易也。

「言高秋天而不可施」的作品，儘管辭藻美麗，夸夸其談，畢竟是脫離現實的空論。我們試看王弼、何晏以來所謂的「名理之文」，不正是「屬難驗無益之辭，治靡麗虛言之美」的嗎？據崇教篇「釋老、莊之不急」和重言篇「辨虛無之不急」二語來看，葛洪這段話的鋒芒，是針對着玄言家們的著作的。對於詩歌的品第，辭義篇說：「古詩刺過失，故有益而貴；今詩純虛譽，故有損而賤也。」其衡量準則，還是從它們的實際作用着眼的。

其次是對作品的評價，葛洪並不是把內容與形式同等看待，而是着重在內容。如品評王充的論衡，就是這樣：

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，而不損其深也；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，而無虧其峻也；夏后之璜，雖有分毫之瑕，暉曜符彩，足相補也；數千萬言，雖有不豔之辭，事義高遠，足相掩也。（喻蔽）

一部著作是否有價值，主要先看它的內容。內容與形式達到高度的統一，當然屬於上乘。如果形式較差一些，那也是次要的；更不能在辭句上挑剔。因為作品給讀者所起的作用，不完全在於它的形式，最重要的還在於它的內容。葛洪能抓住論衡「事義高遠」的內容，駁斥魯生形式主義的論調，是極有說服力的。

語言和文字的關係，葛洪也有所論述。喻蔽篇說：「夫發口爲言，著紙爲書；書者所以

代言，言者所以書事。」鈞世篇又說：「書猶言也，若人談語，故爲知有（二〇），胡、越之接，終不相解。以此教戒，人豈知之哉？若言以易曉爲辨，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！」很顯然，葛洪是以語言的「易曉爲辨」來反文字的「難知爲好」的。語言本是隨着社會的發展不斷蕃衍，社會起了變化，語言也隨之起變化。而文字又是「代言」和記錄事物的工具，應該通俗「易曉」，纔能起「代言」的作用。「難知」已經不對了，偏要「以難知爲好」，那更是故意使人看不懂，違反了「代言」的本意。葛洪這樣地強調書須易曉，是與他主張文學的今勝於古、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和反對貴遠賤近的風尚分不開的。因爲「難知」的作品，決不會起它應起的社會作用，也必然是貴遠賤近的產物，更不可能今勝於古。所以極力反對。同時，他還指出了古書「難知」的底蘊：

且古書之多隱，未必昔人故欲難曉，或世異語變，或方言不同；經荒歷亂，埋藏積久，簡編朽絕，亡失者多；或雜續殘缺；或脫去章句。是以難知，似若至深耳。（鈞世）

這真是一針見血地戳穿了那些貴遠賤近和故爲艱深者的借口。

古代典籍雖有「難曉」之處，但葛洪並非不可知論者。他認爲：「蓋往古之士，匪鬼匪神，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，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，情見乎辭，指歸可得。」這就是說，「布在乎方策」的作品，既然是「情見乎辭，指歸可得」，那就有認識的可能了。



此外，葛洪曾提出批評者不能「唯見能染毫畫紙者，便概之一例」（尚博），更不可從個人好惡出發，「愛同憎異，貴乎合己，賤於殊塗」（辭義）。而兩處上文明說是「俗士」和「近人之情」，可見這不是在空發議論，而是有針對性的。

抱朴子外篇中的文論，大致如上所述。無論廣度和深度，都超越了揚雄、桓譚、王充、曹丕、桓範諸家，值得我們進一步研討。毋庸諱言，葛洪的文學思想也有一些缺陷。其中最主要的是：建安以來的文學，本已初步獲得了獨立的生命，人們對文學的認識，也日益明確，而葛洪却又把一切著述都看作文學，這就形成了他那不明晰的文學觀念，也就不可能對文學有進一步的瞭解。但從發展的眼光看，葛洪在我國古代文論上是有較大的貢獻的啊！

外篇爲葛洪「騁辭章」（內篇黃白）之作，行文多韻語和駢言（二），因而書中徵事數典之處比比皆是。過去既無人注釋（三），一般讀者閱讀時不無困難。爲之疏通證明，確有必要。校注古籍，我是有嗜痂之癖的。一九四零年秋——在燕京大學國文學系作助教的第一二學年，因開選修課「昭明文選」，祇承擔兩班「大一國文」課，閒周一次的批改作文任務減少了三之一；次年又改開「文心雕龍」和「讀書指導」兩課，「大一國文」課則止教一班了。批改作文的任務既逐年減少，搞科研的時間自然增多。抱朴子外篇校箋初稿，就是在這兩年